



## 一、前言

語言是人類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種交際工具，在語言的世界裡包含了口語、書面語(即文字)、手語、旗語、電報密碼等不同的符號系統，而其中最方便簡易的就是口語了。世界上的語言總共有多少種呢？三千多、四千多或五千多？說法不一而足，不過，不同的民族、國家使用相同或相異的語言，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如英、美二國皆用英語；而同樣是拉丁民族，但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並不一樣。有時即使在同一國家內，因為次方言或他族語言的並存，所顯現出的語言差異之大可能甚至凌駕不同國家之上，如中國境內除了有10種漢語方言外還存在著許多多少數民族語言；印度境內則使用著15種不同的語言以及上千種方言。

語言既然是溝通交際時不可或缺的媒介物，因此使用不同語言的民族、國家也往往展現出不同的民俗國情，這些不同的風俗習性其實就是文化，在彼此相同或迥異的文化特性中，我們可抽繹出人類共通的「共性」，卻也可在其間見到不同的「個性」，這些個性，即是文化上的差異，表現出來又往往反映在肢體語言和生活習俗上的不同，影響所及甚至可能造成語言翻譯上的諧趣。以下，我們就來看看一些有趣的例子吧！

## 二、打招呼的方式

打招呼是一種日常的交際行為，除了用語言的方式說「嗨！您好！」或是如洋人般說「哈囉！」之外，還可以運用如身體語言的其他方式。例如古人是打拱作揖，現代人則習慣以握手為之；歐美人經常以握手、接吻、擁抱的方式來打招呼，這不算什麼，我喜歡庫泊愛斯基摩人問候人的方式，他們是用一個拳頭連打對方的腦袋來打招呼，如何？夠酷吧！拉丁美洲有些地方的人則習慣以拍對方的背為禮，嗯！如果和對方有仇的話，這個方式倒挺不錯的，可趁機報仇；波利尼西亞有些地方的人則是以擁抱和互相擦背來打招呼(葉蜚聲、徐通鏘1993)，這對不那麼習慣肢體接觸的中國人也是個新鮮的方式。日本人在認識說漢語的人時喜歡說「初次見面，請多關照」，這本來是按照日語習慣翻譯過來的一句客套話，說漢語的人在同一場合並不這麼說；但一些常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國人當他們結識一位新的日本朋友時，卻常常免不了會來上這麼一句(朱志平1993)，說明語言有折衷隨俗的功能。

除了打招呼的肢體語言外，世界各國的人也常以點頭表示同意，搖頭表示不同意，但事實顯示也並非每個民族皆如此。如中國境內的佉族人就用搖頭表示同意；塞孟人以頭往前衝

表示同意；奧維崩達人伸出食指在臉前晃動表示不同意(葉蜚聲、徐通鏘1993)。在印度北方的婦女戴頭巾被視為出身體面、有教養、有德行的表示，而在南方則被當成寡婦；另外，北方婦女以搖頭表示否定，而在南方則表示肯定(王秉欽1994a)。招呼人過來一般是手指向裡擺動，可是有的民族是手掌朝下，有的民族是手掌朝上。可見打招呼雖然是一件再簡單和基本不過的問候語，但表現於各民族間卻可一窺其間不同的文化國情。

### 三、顏色詞顯現的不同國情

顏色詞在語言科學裡是一個特殊的領域，不同的民族對顏色的觀感是不一樣的。以「紅色」為例，俄漢兩民族基本一致，都認為紅色往往具有昌盛、幸福、美好、快樂、革命、權力等意義。可是在英美人眼中，紅色卻讓他們聯想到危險與極端，如電影「紅色警戒」屬之；反而在他們眼中具有如中國紅色類似特點的顏色是「綠色」和「白色」，如「白宮」代表美國政府；影響所及，當戴維·霍克斯在翻譯《紅樓夢》時，便把「怡紅院」譯為「綠色庭院」，把「怡紅公子」譯為「綠色公子」。更有趣的是，中文裡的「紅眼病」，譯成英文也成了「green-eyed」(王秉欽1994a)。

另一個有趣的對比是「紅茶」一詞，漢語中的紅茶為什麼翻譯成英語乃至於俄語時卻變成了「黑茶」(black tea—英черный чай—俄)呢？這是因為不同民族對顏色的取向不同所致。中國人著眼於茶水的湯色，英國人和俄國人看到的卻是茶葉的顏色。茶原產於我國，16世紀下半才開始傳到歐洲，於是漢語「茶」這個詞也借入西方語言。例如法語「茶」叫the，德語叫tee，都源於閩南方言茶的讀音[te]。俄國人對茶知道的較晚，17世紀初通過荷蘭傳到俄國，不久便直接從我國西北地區進口，俄語茶叫чай，正是從北方方言茶[tsha]音譯的(王秉欽1994b)。所以，追索茶文化的傳播路線能幫助我們了解「紅茶」翻譯之謎。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人視紅色為吉祥、喜慶的顏色，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可見到以紅色表示「危險」的訊息，如過馬路時人車見紅燈需停止；水庫和游泳池以紅線標示危險區域；電氣用品中也常以紅色標誌表示危險、注意。此種以紅色表危險、不祥的意義，是否是受到西方顏色詞的概念所影響抑或是紅色在中國原先即具備正反不同意涵，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另一個東西方也有不同定義的顏色是「黃色」，根據《說文解字》的記載，黃色本為「地之色」，為五色之一。古籍中的「天玄而地黃」以及古代以五行配上方位、顏色時，「土」居中央，中央之色即為地之色——黃，這說明黃色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即因黃為土地的顏色，影響所及，在古代漢語或傳統文化中，黃或黃色具有高貴、權力、美好之意。例如因為古代帝王的龍袍是黃色的，漢語中一批如黃門、黃曆、黃屋、黃鉞、黃袍加身、黃旗紫蓋的詞，便與皇權地位相聯繫(王作新2001)。

可是當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時，受到西方語言文化的影響，漢語裡的黃與黃色便出現了其他意義，如俄國人認為黃色象徵著對愛情的背叛，因此俄國人以前非常忌諱給女人送黃色的花；而在法國，“黃色工會”是指由工賊所控制、具有反動成份的假工會；黃色在西方媒體又有兇殺、淫穢、富有低級趣味、下流的涵義(王作新2001)，所以便有黃色刊物、黃色電影、黃色小說、黃色笑話等詞出現。這些詞語與文化進入中國後，也就讓黃色在正色意義之餘，也因此蒙上了另一層諱語的意義。

#### 四、圖騰、象徵物的不同意象

英漢兩種語言中都有「龍」的概念，但dragon在英語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爬行動物，是可怕的惡的象徵，在《聖經》中龍是被喬治用梭標殺死的。因為英美人是如此的討厭龍，所以把打人的警察叫做「龍」(王秉欽1994a)，因此在進行外語翻譯時應該注意此種因為文化差異上的不同所導致的「詞彙空白」現象。有趣的是，在面對「亞洲四小龍」此一名詞時，俄文原應譯作“четыре тигра в Азии”，英文則譯為「four tigers」(王秉欽1994a)，顯然都是因為文化中對龍的排斥影響到翻譯的結果。

但是「龍」在漢語中則恰恰相反，在我國古代，龍是神聖的象徵，在傳說中是一種有鱗有鬚能興雲作雨的神異動物，因此古人以龍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的象徵，後來又引申為高貴、特異的象徵，在語言中也就相應出現了龍顏、龍袍、龍庭和鳳子龍孫等等褒義詞(王秉欽1994a)，所以龍是我國文化的特產，是一種文化個性。

俄國人眼中的龍，也是又凶惡又醜陋的怪物，評價甚低，反而「熊」( )在他們文化中的地位足堪比擬中國的龍，熊是俄國人非常喜愛且崇敬的一種動物，它具有圖騰意義和吉利的象徵，常被做為吉祥物，如1980年莫斯科舉辦第22屆奧運時曾徵選吉祥物活動，當時熊就以超高票數勝出而獲選。俄國人喜愛熊還體現在詞語上，如熊可以象徵“主人”(хозяин)；俄羅斯諺語中也有“家中之主猶如林中之熊”(Хозяин в дому, что медведь в бору.)的說法；熊還象徵“未婚夫”(жених)，假如一位姑娘在夢中夢見熊，則表示將要出嫁(王秉欽1994a)，顯然熊在俄人眼中有吉祥可愛之意，但另一方面它也常被喻指笨拙和懶惰(吳國華1994)。在中國，除了貓熊是代表可愛外，一般來說熊象徵著巨大、凶惡、蠢笨遲鈍以及膽小等貶義，所以在進行文化比較時應注意其間的差異。



除了熊之外，還有一些動物詞語也顯現出不同的文化象徵涵義，如「貓頭鷹」(COBA)在俄國人心中是智慧的象徵，但在中國人來看卻視為不祥之鳥；澳洲毛利人則認為在軍事會議期間有貓頭鷹從頭頂上飛過是預示著“勝利”的意思(王秉欽1994a)。另外，「鶴」在俄國人心中是“春天”的象徵，在中國人心中則是仙禽，是“長壽”的象徵。由於二國文化國情的不同，由這兩個詞不同的象徵意義曾引起一則笑話：一位中國畫家將一幅畫有九隻神態各異的仙鶴圖贈給一位八十高齡的蘇聯友人，原本寓意：祝您長壽，但透過翻譯俄國人卻不能理解，這也是一則因為國情文化差異下所衍生翻譯時無法恰當尋找對譯詞，以致於變成詞彙空缺的結果。

「竹」在中國有正直、堅強、氣節、清遠之義，是中華民族性格的象徵，所以魏晉有“竹林七賢”；唐代李白、孔巢父等人號“竹溪六逸”；北宋廖正一自號“竹坡居士”等，可見竹在中國文化中有其不可取代之文化意義。在俄國文化中，差堪與中國的竹相比擬的是「白樺樹」(берёза)，這是在北半球種植極廣的一種樹木，俄國北部和中部地區到處是繁茂的樺樹林，因為俄國人極珍視此種樹，所以將之稱為“國樹”，影響所及，在烏拉爾山脈有“白樺山”，以“白樺月”象徵一年的第一個月，用白樺樹慶祝新年叫“白樺新年”；此外，白樺樹還表示女性的堅強、忠誠、純潔、美麗，表示對愛情的忠貞不渝，所以“白樺枝”也象徵在求親時表示女子同意出嫁(王秉欽1994a)。從竹與白樺樹在中俄兩國的不同象徵意義卻同樣具備標示民族文化性格特質來看，了解一個國家除了可藉由歷史、風土人情的掌握外，語言以及翻譯背後所呈顯出來的文化特性，也是幫助吾人認識不同種族文化的一個窗口。

## 五、結語

本文藉由若干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語彙來進行說明，希冀透過文化對比的角來突顯不同民族國家間的文化共性與殊性。語言是思想文化的展現，穿過語詞的密林，最終目的是要了解文化體系的深層結構，以上只是選取一些詞語和肢體語來說明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而正是基於種種不同的差異性，地球上的文化才得以呈現出繽紛多采的樣貌，而人類文明也才有向不同觸角視界延伸的可能性，這，也許才是語言與文化中最引人入勝之處吧！

## 引用書目

- 王作新 2001《語言民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王秉欽 1994a〈論詞的文化伴隨意義與翻譯〉，《文化與語言》(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王秉欽 1994b〈論東西方思維方法差異及其翻譯〉，《文化與語言》(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吳國華 1994〈詞彙文化伴隨意義的跨語言(俄語和漢語)對比研究〉，《文化與語言》(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葉蜚聲、徐通鏘 1993《語言學綱要》，台北：書林圖書公司